

田英华◎著

语言学视角下的

传记体研究

绪论

传记体及其研究概况

传记体的性质及类型

传记体的语言

传记体的语体属性

传记体中语言要素的特点

传记体的语篇

传记体的修辞

传记体的叙事

传记体叙事的主题意义建构

传记叙事中的隐喻

传记体中的叙述者与作者

传记体的叙事时间

传记体的互文性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

田英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 / 田英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5
ISBN 978-7-5473-0486-0

I. ①语… II. ①田… III. ①传记文学—文学语言—
研究 IV. ①I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494 号

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6-0
定 价: 26.00 元

序 言

田英华博士的《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写一篇序。研习语体风格几十年来,还未接触到语体学意义上的“传记体”,这无疑是个学习机会,借此触摸一下传记体的相关问题,以补识见之缺。

从语体学的角度来研究传记,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此前还未曾有人涉笔,可谓是一空白。所谓“空白”,一是此前的语体学研究,多涵泳在新闻语体、司法语体、公务语体、日常语体、公关语体、广告语体等方面,还没有触及对“传记”的系统探索;一是尽管国人对“传记”的研究,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都侧重在对传记语篇话语的叙述,疏于对语言特征、叙事本质、语篇结构、修辞表现作学理表述,更缺乏对“体”作系统理论阐发。本书在对传统“传记”研究全面扫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立意高远,视野宽阔,丰富了当代语体学的内容。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作者能自觉地运用当代语体学、叙事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修辞学等理论,以历时与共时文本为语料,采用描写、比较的方法,对传记进行整体观察,初步构建起一个传记体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是:1. 学科研究史;2. 属性与特征;3. 生存空间与状态;4. 宏观语义结构;5. 言语风格形态;6. 互文性。体系内在逻辑严谨,论述入理,结论稳妥。本书所提出的传记体研究范畴,如叙事范畴、宏观语义结构、互文性等,都可作为传记体研究的元范畴使用。在主范畴里,又进一步剥离出次范畴。如叙事范畴,其下位就有叙事主题、叙事主

体、叙事隐喻、叙事顺序、叙事频率等次范畴。这些范畴在深入揭示传记体的本质特征上,发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强力。与传统研究比较,感悟性成分减少,科学性成分大增,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最惹人青眼者有三:

一是对“叙事性”的论述。一切传记都是叙事性的文本,叙事是传记内在语义流动的脉冲,推动着人物史迹有序运行。正如作者所言:“传记作品要叙述一个人的一生,必须将人物一生的诸多事实组织成事件,并将它们安排在一个完整的有序的框架之内,使得这些事件在这个时间框架内显得很连贯,并好像有些具有前后相连的因果关系。”更确切地讲,叙事是对传主一生所涉事件,以时间为主轴的自然流向和空间方位移动的展示过程,是对传主一生历时演化过程的表述,“过去时”经验性是其本质特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传记叙事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对于史传尤应如此。然综观当下形形色色的“传记”,如按太史公的“实录”尺度鉴衡,^①人们会惊叹:形态各异,真假难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传记热持续升温。^②在传记热的声浪中,最热莫过于对曾国藩一生功过是非的撰述。有关曾氏的传记,据笔者粗略统计就有20余部。掩卷沉思,各书所传,评价巛谷情由传者,然传主的人生行径,岂容任意涂青点丹,颠倒黑白!由此想到其他各传是否也有类似问题。面对如此情势,我们在寻觅历史真实史传的同时,更需要规范作传的原则与规则。当务之急是将史传与文传(文学传记)在学理上予以区分,严格区分所述事实的已然与或然,严格区分传者好恶与史迹的客观。

其二是“宏观语义结构”命题的引入。“宏观语义结构”是个典

① 所谓“实录”,班固在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② 据2011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统计,传记类图书占第二位,计1550种,比上年同期增长14.22%。史传类图书出版持续增长,固然是市场经济所驱动,然其深层缘由则是迎合了人们寻奇探隐的心理诉求。

型的舶来概念,最早由德国人凡·迪克(Van Dijk)所提出。凡氏认为:宏观语义结构是一种超结构的模式,它能够决定一个语篇各个部分的组排顺序。^① 田英华认为:宏观语义结构“是由一些语义单元及其相互间的语义关系、语义转换规则等共同组成的一种抽象结构,它是在语篇意义生成和解读过程中在作者或读者的大脑中建构形成的一种语义框架形式”。就传记体而言,即作传者以经验图式为参照,经多次归纳,总括出传主人生主调,并以此为主轴,以递归原则为主导,构建起特定传记的叙事结构。它如同人体脉络一样,统贯语篇整体,引导、协调、润滑着叙事系统的运行。可见,在传记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叙事是脉冲,主调是能源,而宏观语义结构就是脉络(可称为体脉结构)。

对于体脉结构的研究,国人此前多在写作学、文章学、古代文论中进行。国外则有韩礼德(Halliday)、凡·迪克、拉波夫(Labov)等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等学科里围猎。其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多重在阐释各自的学科理论和实际运用,较少从语体切入,更无传记体阐释。体脉结构在语体中的存在状态有二:一类是以显性静态的形式存在,其标记明显,具有物质上的可把握性。吕祖谦在《古文关键》里谓之“有形纲目”,即所谓“开头、主干、结尾”之谓。另一类是以隐性动态的形式存在,犹如人体的经络,运之有序,察之无形,但却贯通于语篇的整体,吕氏称其为“无形者血脉”。所论“有形”,类似外语学界所谓的“衔接”(cohesion),后者即所谓的“连贯”(coherence),前者为形式连接,后者是语义联结。先于吕祖谦 600 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里,对“纲目”与“血脉”,即“形”与“义”的关系,交代得极为透辟:“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

① 参见钱汝敏:《戴伊克和话语宏观结构论》(上)(下),载《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2~3期。Dijk,亦译为戴伊克。

文绮交,内义脉注。”不管今天人们如何对语篇的形式结构条分缕析,都难以跳出刘勰和吕祖谦所论的范围。尽管体脉结构千变万化,都越不出“起承转合”,即八股之“破题、承题、起讲(内蕴四比八股)、收结”。西人拉波夫在研究叙事模式时,认为叙事的自然顺序是:点题(abstraction)、定向(orientation)、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评议(evaluation)、结局(resolution)、收尾(coda)。拉波夫的模式竟与中国的八股结构何其相似乃尔!①

三是对“互文性”的阐发。用互文性理论,来阐释传记体特征极富创造色彩,无疑是个大胆的尝试。“互文性”概念首倡者朱丽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②祝克懿教授在解释“互文”时说:“‘互文’之‘互’指存在于当下的文本与之前、共时的源文本成分间有以互动关系制约下的组合关系、共现关系、重写关系。而‘互文’的‘文’,实质上是指当下文本成分与源文本成分构建的共组文本。”③两相比较,祝氏的阐释更为在理,她谨慎地避开了“任何文本”的武断性的结论。④田英华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故其使用互文理论时,特别声明是“狭义意义上的互文性”,并且专门设置了一小节,从四个方面对传记体的互文与虚构叙事文本互文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辨析。

国人对互文现象虽早有觉察,并在文论中时有论及,但却疏于作形而上的理论概括,一直到清末民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创“境界说”时,始现今之互文论的中国版。静安先生在论及“三种境界”时,其表述所用的话语非理性概括,而是以“互文”描述:一境

① 参见丁金国:《语体风格分析纲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6页。

② 转引自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载《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五期。

③ 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载《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五期。

④ 笔者认为:互文性的论域不能任意扩张,不能把一切影响语篇建构与运行的要素都通归于互文性的作用,更不能把“一切文本”,都断言是“互文”。都是互文就没有互文,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互文理论。

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的描述语，源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王氏用以表达“凡治学问者，须广泛涉猎，刻苦研修，不畏艰险，殚精竭虑，方有望达到学问的巅峰”之义。静安先生认为：“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也。”实际上，王氏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借境。他进一步强调，借境的前提是“自有境界”，古人的境界才能为我所用。可见，“借境”理论是由三个要素所构成的：自有境界、借入境界和创新境界。自有境界是始原，即王氏所论“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借入境界的语义结构必须与始原结构在语义上有潜在的关联性，方有可能被借入。始原的语义结构通常是显性的，而借入结构的语义有的是显性，有的则为隐性，但不管显性抑或隐性，都必须通过隐喻过程（即造境过程），转化为与始原结构语义同构，重组为创新结构。不言而喻，创新结构存在着高下工拙，这里不再赘述。“借境”理论较之“互文”理论也许更符合汉语话语运行的习惯，更能切入此种语用现象的本质。它既可以摒除互文理论的武断性和混沌性，也为具体的言语运用提供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借境”理论可径直锁定论题本身。

作为传记语体理论体系的整体，对其语体风格特征的论述，应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对史传体的风格，必须作出理论上的点拨和限定，一者利于分辨真伪和廓清传记形态上空的雾霾；再者以防纯语言分析之弊的发生，为史传语篇的写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愿田英华博士的探路之功能引来更多探索者。

丁金国

2011年7月19日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1
第一节 传记体及其研究概况	1
第二节 传记体的性质及类型	19

上篇 传记体的语言

第一章 传记体的语体属性	31
第二章 传记体中语言要素的特点	36
第一节 传记体的总体语言特点	36
第二节 传记体中词语运用的特点	39
第三节 传记体中句式运用的特点	54
第三章 传记体的语篇	63
第一节 传记体的语篇结构	63
第二节 传记体的主位结构	79
第三节 传记体的及物性	94

第四节	传记体的引语	100
第四章	传记体的修辞	115
第一节	传记体的修辞特点概观	115
第二节	传记体中常用修辞格的例析	120
 下篇 传记体的叙事 		
第五章	传记体叙事的主题意义建构	139
第一节	传记体叙事主题意义建构的必然性	139
第二节	传记体主题意义建构的语言手段	141
第六章	传记叙事中的隐喻	157
第一节	传记叙事意义中的隐喻	157
第二节	传记叙事中隐喻和转喻的理解机制	158
第三节	传记叙事中一种突出体现隐喻意义的语言 手段——名物化	160
第七章	传记体中的叙述者与作者	168
第一节	传记体中叙述者与作者的同一和分裂	168
第二节	传记体中叙述者与作者同一的表现	172
第三节	传记体中叙述者与作者分裂的表现	178
第八章	传记体的叙事时间	187
第一节	传记体中时间凸显的特性与意义	187
第二节	传记体的叙事顺序	191

第三节 传记体的叙事频率	198
第九章 传记体的互文性	207
第一节 传记体中互文性的成因和特点	207
第二节 传记体中互文性的表现形式	209
第三节 传记体中互文性的意义及阐释	228
结语	230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54

绪 论

第一节 传记体及其研究概况

一、传记体的界定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传记”是文体样式之一。在文学或文章学上的“传记”文体,指的就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体样式。“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样式,它的文体意识、它的形式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任何文体,作为一种文章的功能类别,总有它一定的组织结构,也就是体裁的结构样式。我们知道,“文体在实质上是体现着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综合而成的整体特点的,文体的构成除其他因素外,其结构体制都要以功能变异的语言作为(形式方面的)构成因素”。^① 所以任何一种体裁样式,事实上都既具有特定的组织结构、篇幅,也包含有由语言材料的选择、组织以及表现手法的运用等属于语言形式的各种因素所体现出来的系列性特征。文体的各种语言特征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一种言语体式,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体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言语体式”(或语言体裁)。这种“言语体式”,也就是陈望道先生最早在《修辞学发凡》

① 李熙宗:《文体与语体分类的关系》,《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中提出的作为语言风格学概念的“语文体式”,在当前的语体学、语言风格学中也有人称之为“言语体裁”、“语言体裁”、“语言体式”,是汉语语体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术语。它是言语形式的一种,是“在具体运用语言,构成言语组织的时候,依照一定的形式把言语组织起来的产物”,“比方说,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照诗歌的形式来把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组织成言语结构,这种言语结构就具有诗歌的体裁。同样,如果在运用语言时按照的是小说或别的什么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组成言语结构,那么,这种言语结构就具有小说的或别的什么体式”。^① 李熙宗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这种言语结构形式类型“是一种受语言运用相关因素制导而形成的由语言作品内在形式外化而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性形态或格局;是一种为大家约定俗成并加以遵循的隐匿性体式规范”。^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表达思想感情时,我们都会按照一定的形式组配言语,以形成一定的可以称之为某种“体式”(或“体裁”)的言语结构形式类型。从语言学着眼,作为一种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文体形式,“传记”同样也是一种言语结构形式单位,是一种具有特定表达功能和特定结构形式的言语体式。

至此,立足于语言本位并结合本书特定的研究目的,我们给传记体作如下的界定:“传记体”,就是指运用语言构成传记作品时,受传记的交际功能、交际意图和交际领域等的制导,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并以一定的形式加以组合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整体性和个性特征的言语结构形式类型。本书的研究正是以这种“传记”言语体式为研究对象,就其语言运用上富有特色的几个方面作系统研究。

①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语言学名词解释》,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9页。

② 李熙宗:《“语体”与“语文体式”》,《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传记文体的历时演变

(一) 传记作为独立文体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的传记文体的渊源是很早的,而且成就也比较大。传记的萌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就在口口相传地讲述着一些先祖的英雄传说。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些记载先民英雄传说的诗篇,如《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就有传记的萌芽。传记的雏形是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其中《左传》、《国语》将记言与叙事结合起来写,使历史事件故事化,这也就是传记作品“叙事化”的初期表现。《战国策》中一章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实际是开创了传记“记一人为主”的体例,为后世开启了“单传”的先河。到汉代司马迁著成《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记人叙事的模式,使传记形式实际上达到了成熟。不过由于我国古代对独立文体的意识不强,传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存在并没有得到确认,《史记》以及其后的历代正史虽然都沿用“纪传体”形式,但却是被列入“经史子集”的“史部”之中的。

到汉魏六朝时期,各种文体已经大体完备,将传记视为独立文体的意识也逐渐明朗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别论述了多种杂体传记的特点,特别是其中的“史传”篇,第一次把“史传”作为一种文体加以探讨。到了唐宋时期,“传记”被视为独立文体的意识已渐为明晰。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进一步对《史记》纪传体作了阐释:“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①刘知幾还对史

① 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传的特征和它的一般写作原则作了一些论述。

明代的辨体意识更为明确,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中已经称这种文体形式为“传体”,其中对“传体”的序说是:

按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

这条序说,对“传体”名称的来源、司马迁创“列传”,以及其后传体的应用作了简要说明。

到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专立“传记”篇,把“传记”作为一门独立的文体加以论述。他指出:“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②他首先从传记文体的名称说起,指出了中国古代传记的“释经为传”的特征,而“传记”一词表示记人叙事的文体名称是后来演变而出的。中国传记之所以文体得不到独立,恰恰是它依附于历史所致。他还认识到传记不能等同于小说,如他在《和州志列传总论》中指出“《穆天子传》、《汉武内传》小说之属也”。可见他对传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意识已相当清晰、准确。

到近现代时期,传记文体更加得到大家的重视。梁启超吸取

①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传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249页。

西方传记的优点,提出了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专传”概念。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专传亦可以叫做专篇……我所谓专传,与列传不同。列传分列在一部史中,专传独立成为专书。”^①他在《新史学》中把旧史学分成十种,第六种就是传记,传记又分为通体、别体两大类。到“五四”前后,胡适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名称,使传记的文学性质更加凸显。胡适大力宣扬提倡传记的写作,在郁达夫、朱东润等以及其他现代传记理论研究者的推动下,传记文体成为一种备受关注和广泛应用的文体。当代对传记文体的认识更加全面,作品的创作也更加自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形成了传记创作的高潮。

(二) 传记文体形式的形成和发展

1. 《史记》“纪传体”的形成和特点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形成了传记文体的雏形。但是,“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乃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②也就是说,由于《左传》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阐述经典、记录史实,还没有真正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形式。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始形成了成熟的传记形式,即“纪传体”。

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主要是记载历史,但它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而且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一生的事迹,刻画出了人物的形象、性格和命运。因此,《史记》一向被研究者认为是传记的开山之作。它在很多方面为整个传记文体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史记》确立了传记体专门记人叙事的目的和功能。司马迁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创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作目的具体体现在：其一，实现父亲遗愿，歌颂当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的写作对象主要是那些扶持正义、有卓越才干的人。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其中“俶傥”是卓越杰出的意思，指的就是非常杰出而能建功立名的人。这是司马迁选择传主的重要标准，也是后代传记遵循的标准。其二，继《春秋》，惩恶劝善，具有教育目的。他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述往事，思来者。”可见他写史传是要给后来人作借鉴用的。其三，他也为普通人“欲砥行立名者”立传，意欲使他们流传于后世。《史记》的这些写作目的都为后代传记写作者所继承，从而确立了传记这种形式的基本交际功能和意图。

其次，《史记》在叙事上体现出高度的以记一人重要特征为主的“主题性”。明代陈仁锡在《陈评史记》中指出：“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史记》对主题的确立完全服从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即所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①《史记》的这种“成一家之言”的写作手法也为传记独成一体奠定了基础，使传记既不同于专列史实的历史文献，也不同于简单的人物年谱的形式。而且，司马迁叙事以人为主体的，他所采用的“生平——事迹——评议”的叙事框架也成为后代传记的基本框架模式。在整体叙事上，他一般采用顺叙的形式，对大多数传主都是从出生、家世情况写起，直到其死亡，甚至对传主死后的一些相关事件也加以叙述，体现出传记记人的完整性。在事件安排上也有很明显的详略差异，注意运用一些细节或对话的细节描写的语言形式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点。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470页。